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



○毛曦 段建海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毛曦 段建海 著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毛曦, 段建海著.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0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ISBN 7-5419-9673-4

I. 司... II. ①毛... ②段... III. 司马迁 (约前145或前135
~) —史学—研究 IV. K092.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88408号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

毛 曦 段建海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181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9-9673-4/K·84
定 价	14.50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 西安太白南路规划路2号 电话: (029)88231355

作者简介

毛曦，1966年生，陕西泾阳人，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91年、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2004年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出站，现为大连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史、中国历史地理、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1998年被评为西安市首批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享受政府津贴。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地理》等著作，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等课题6项。

段建海，1963年生，陕西省澄城县人。198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历史透析》、《美和自由的人生——庄子寓言新解》等著作10部，承担、主持省部级、厅局级课题多项，获省、厅级多项奖励。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1995年8月出版（11种）：

司马迁一家言
司马迁行年新考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
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
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
史记与中国文学
司马迁与地学文化
司马迁与宗教神化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司马迁的创造思维
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

2000年9月出版（6种）：

史记题评
司马迁与中国天学
史记与中国农业
史记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2006年10月出版（6种）：

司马迁兵学纵横
史记列传图志
司马迁与中国地理
史记叙事研究
司马迁与史记学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

陕西省『九五』出版规划重点书目

■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编写

■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编委会

□ 顾问 董继昌

□ 丛书策划/张 炜 李宝生

□ 名誉主编/袁仲一 赵光勇

□ 主 编/吕培成 徐卫民

□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大宪	田 静	吕培成	齐孝斌	何清谷	李宝生
吴永琪	吴秉辉	张新科	张 炜	姚雪琴	徐卫民
徐兴海	高益荣	商国君	程世和	符 均	曾志华

序 言

董继昌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陕西乃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于1992年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到现在为止，大型工程《史记研究集成》（汇校汇注汇评）已全面展开，1998年底十二本纪部分已全部完稿，大型电视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已拍竣六集，大型丛书《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第一批书目（11种）已于1995年8月“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前出版，第二批即将于今年8月以后陆续出版。对这些可喜的成绩，我感到十分欣慰和由衷的高兴！这里仅就“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说几句话。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主旨是从《史记》是百科全书这一广阔领域内揭示司马迁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论述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贡献，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其内容包罗天、地、人、物等系统知识。

过去，人们通常赞美司马迁是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或

以“史圣”誉之，但这都不足以全面体现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郭沫若先生曾以“功业追尼父”称颂，认为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是一点不假的。事实上，司马迁本来就是以继承孔子而自许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为了不辱父命，继承孔子伟业，司马迁便坚定地肩负起效法孔子著《春秋》而写《史记》的崇高使命。对于《春秋》，司马迁不单单看作是一部“史”书，而视之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文成数万，其指万千”，旨意高远、内容丰富的纲领性的文化经典。他的《太史公书》亦绝非一般“记言”“记行”的史官之举措，而是在“综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的基础上，要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而这“一家之言”，不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补六艺之不足，还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较之《春秋》，其内容要丰富宏伟得多，且具有明显的突破性和超越性。

司马迁以孔子之后的文化领袖自许，决心写出胜过《春秋》的《史记》，这并非狂言欺世。论《史记》的成就，不管从中国历史长期已行的实践性，或从集文化之大成的广博性和从领风气之先的进步性哪一个方面而言，较之前人都是后来居上之佼佼者。如以实践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外儒内法的政体，并非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实则以司马迁崇儒而不弃法的思想所构建；上层文化领域内百家竞流的实际，也非孔子一家的独行，而是司马迁“整齐百家”的再现。论其文化知识面的广博，李长之先生誉司马迁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巨著《史记》当然

也就是“百科全书”类的宝藏了。《史记》除了囊括孔子所致力于的诗、书、礼、乐之外，又融汇了百家学说于一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民俗，特别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科技等；而且并非停留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整理介绍阶段，力求作到“通古今之变”的论述，让人们“原始察终”充分认识其历史源流的发展变化。论其文化思想的进步性，且不必详列对各科文化的卓识远见，仅就政治上不提倡“克己复礼”，而在总结“承敝通变”的基础上大力颂扬革新进步；经济上不重本抑末，而提倡创造财富发展商品经济；在国家的统一上，不囿于“华夷之分”的狭隘圈子，而提倡华夏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民族大一统的崇高思想；对外不是闭关自守，自我独尊，而是竭力介绍域外物产，让人放眼更广阔的天地。诸如这些思想认识，不仅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十分杰出的、领先的，即使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亦是闪闪发光，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华夏文化巨人，其文化思想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的组织者和编者，充分认识到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及其崇高地位，不再囿于史学、文学范围的研究，推而广之，努力开拓新的领域，着眼于多层面全方位的探讨，丛书第一批 11 种选题涉及司马迁的一家言、创造思维、经济思想研究、民族思想阐释、教育思想述略、行年新考，司马迁与宗教神话、与今古文经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会组织的第二批书稿，则进一步集中体现了《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的特点。这批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司马迁与中国天文学、与中国地理、与中国农业、与中医药文化、与古代汉语语言、与编纂学、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待。这些课题的研究，有不少是带有开创性的。华夏文

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些在《史记》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像本丛书这样全方位深化对司马迁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充分探讨《史记》的丰富意蕴,总结三年的人事盛衰存亡、成败得失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借鉴作用;科学评论司马迁的崇高精神及对文化的巨大贡献,让人们为有如此震古烁今的文化巨人而自豪,本身就具有产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强烈感染力;重视阐明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丰功伟绩及进步思想,既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非常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丛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收集的各家的论著,不强求观点的一致,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学术研究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争议,更何况对司马迁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确属开创性的事业,更需要各抒己见,互相争鸣。

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所撰写的《史记》,总结了中华三千多年的古代文明,是第一部集华夏文化大成的百科全书,其博大精深的內容,需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花更多的精力来不断研究。因此,我热切希望更多的学者和海内外热爱华夏文化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司马迁的研究,为弘扬华夏文化做出贡献。也希望以此为契机,继续前进,把陕西逐步建设成司马迁研究基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陕西人民出版社为出版这套丛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体现了对积累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对此我表示敬意。

2000年5月写于西安

序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是一部研究、阐释司马迁史学的学术新作。本书探讨的问题，都是研究司马迁史学的根本性问题，系作者多年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心得，多有新义，间或可以看到作者的智慧火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既简明扼要、又全面系统地阐释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著作，是近年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新成果。

毛曦、段建海二位作者都是年轻有为、酷爱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学时，段建海曾随我听过史学理论与中国思想史课程，后来毛曦又做了我的史学理论硕士研究生。毛曦君对章学诚史学做过专门的研究，段建海君对庄子哲学有过独到的见解。他们每位都发表过数十篇研究性论文，成果斐然，可谓史学新秀。近年，他们二人又在共同致思方向的基础上专心研究司马迁史学，并撰成此书贡献于社会，既为万紫千红的司马迁研究的百花园中增添了一枝芳香秀丽、引人注目的花朵，为发掘司马迁优秀史学遗产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又为推进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开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书内容翔实，每有新论，提出颇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多能启发人思，是一本融知识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史论性质的读物。

本书以司马迁史学继承论、创作动因论、历史哲学论、史学思想论、历史编纂论、历史地位论、史学影响论、史学价值论等八部分构筑了司马迁史学研究的体系。这部著作框架，大体上从史论层面概括了司马迁史学的主要成就、主要方面。就这个重点突出而又简明的体系而言，可以说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次创新与尝试。过去，史学界泛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之论文、著述比较多见，然而探讨司马迁历史创作动因、历史哲学者所见甚少。本书能够站在时代大潮的前沿，以多维度的思维方式、运用多元方法论析司马迁的历史创作动因，并且从史学理论层面概括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这本身就不乏大胆开拓、创新之意。

本书对学术界曾经流行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史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本书作者经过比较研究，认为与其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不如说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为更加适宜。因为中国史学，严格地说并非始于汉代的司马迁，而肇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孔子修《春秋》，这部编年体史书的诞生，是中国史学开始的标志，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公论，大概不需要经过多少论证和辩论的了。司马迁对于创立与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贡献，固然是前无古人的，然而，从历史的眼光看，他究竟是在孔子所开创的史学基业之后，踏着孔子的足迹继续前进的。这是尊重历史、也是科学地评价司马迁史学历史地位的重要前提。为了说明这个看法，我自然想起了当代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1958年来司马迁故里韩城太史祠考察时所留下的一首诗：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这首短诗的精神是颂龙门地灵人杰，赞太史公功业千秋。最后，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比较，做出了“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尼父即孔子）的评断，这是符合历史的。郭沫若是历史学家，又是当代诗人，这首诗不仅是抒情的，更是论史的。这里所论司马迁的“功业”，当然指的是司马迁通过著作《史记》所完成的史学大业无疑。既然司马迁“功业追尼父”，也就等于说孔子早于司马迁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孔子由于生活在春秋末期，他虽然没有像生活在汉代的司马迁那样给人类留下了一部洋洋 130 卷 526500 余字的巨著《史记》，但是他删修了“六艺”，给人类留下了中华民族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可贵记录资料，其中《春秋》一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的编年体，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还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治史思想、治史原则与方法。所以，我们才论定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

在这里，我还想谈一谈多年来存在于学术界有关司马迁的主导学术思想的不同看法问题。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的主导学术思想是儒家，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的主导学术思想是道家。这两种看法都有某些史料根据，但是，也都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虽然已经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转移，司马迁也曾向当时的著名古文家、儒家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一代硕儒、著名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深受儒学的熏陶。但是，西汉前期的主要社会思潮、统治思想，则是黄老之学。司

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主导学术思想也是黄老之学。《论六家之要指》中所云：“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里所谓“习道论”，并非学习一般的道家之论，而是指学习当时流行的黄老道论。黄老道论与一般的（或早期的以老子为代表的）道论有重要的区别，一般的或早期的以老子为代表的道论，排斥儒家之学，黄老道论吸纳或融合了儒家之学的某些内容。司马迁的主导学术思想就是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黄老之学。既非纯粹的儒家思想，又包含了相当的儒家思想；既继承了某些早期道家思想，又改造了早期道家思想。这个黄老道论，也就是司马迁所引《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表述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应该说，司马迁把这个主导的学术思想贯穿于一部《史记》的始终。如果有人要问：表现《史记》的主导学术思想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法家思想？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切不可简单化、片面化。汉代已经不存在先秦那样原生意义的儒家、道家、法家了。儒家、道家、法家正在走向合流，所以，《史记》的主导学术思想，既不是原生意义的儒学、道学、法学，又包含了某些儒学思想、道学思想、法学思想。这就是汉代流行的新道家——黄老之学。司马迁将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一文收入《太史公自序》，很明确，是作为写作《史记》的指导思想，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论六家之要指》虽然表现了多元文化论的思想，但是崇尚的还是黄老道家思想。例如，这篇文章在评价儒家、法家、墨家、名家时，都得失并举，唯独在评价黄老道家时，全部是肯定之辞，没有提出缺点。这就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

有关学术思想取舍问题上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其实，我认为东汉人班固在为司马迁做“传”时，早已把此问题讲清楚了。他说：“司马迁……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上述评断，在当时是不难理解的，也是比较符合时代潮流的，“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也就是我对司马迁主导学术思想的理解与认识。搞清楚了司马迁的主导思想，才便于理解与认识《史记》或司马迁的历史观，才能深刻地认识他的史学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认识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过去，我们往往把司马迁仅仅看成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司马迁是一位思想家、文化史家。《史记》的价值，除了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外，更在于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它对历史思想的深刻揭示，它通过历史陈述启发后世的高超智慧。一部《史记》，除表现了司马迁的卓越的史才外，更突现了他深刻洞察人生、社会的伟大思想家的气魄。可惜，学术界多年来对于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的探讨还不能令人满意。

过去一提中国文化，人们很自然地就论到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奠基人。这是对的，毫无问题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中华文化的综合与传播。如果中华文化没有综合与传播，怎能发扬光大、流传至今呢？所以，我认为对于奠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应该有三人，这便是孔子、荀子、司马迁。孔子删修了“六艺”，创立了儒学，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人文道德

学说。荀子实际上超越了儒家，打破了早期儒家、道家、法家的门户之见，运用“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理性主义方法，批评了百家，也综合了百家，使中国文化开始以分析的态度（分析得失利弊）走上综合发展的广阔道路。荀子在学术思想上给予司马迁的影响是很大的。可惜，没有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李长之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司马迁的《史记》不但进一步综合了百家之学，而且综合了中华民族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创造和成果，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以儒道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不但通过《史记》得以世代保存下来，并且广泛地向全世界传播出去，这个贡献是史无可比的。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作为文化史家的司马迁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成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希望有志于司马迁研究的贤达之士、拓新之才今后对于司马迁的研究除了继续探讨他的史学而外，应该把一部分研究力量投向作为思想家、作为文化史家的司马迁的研究方面。这样既可以开拓司马迁研究的新领域，又可以深化对于司马迁史学的研究。毛曦、段建海君所著《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即将与读者见面，二位以大作邀我作序，我虽然对司马迁缺乏深入研究，但多年来也积累了一些想法，故特命笔写了以上数语，略抒所感，是为序。

赵吉惠

1999年5月于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乐处书斋

目 录

序 言 董继昌 [1]

序 赵吉惠 [1]

一 司马迁史学继承论 [1]

1. 继承了中国早期的史学思想 [2]

2. 总结了前代的历史编纂体例 [11]

3. 弘扬了古代史官的伟大人格 [14]

4. 采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19]

二 司马迁创作动因论 [24]

1. 西汉的社会特征及时代精神 [25]

2. 司马迁的人格特质 [32]

3. 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动机 [36]

4.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 [48]

三 司马迁历史哲学论 [54]

1. 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观 [55]